



27. 防暴隊搜查九龍巴士職工總會，拘捕十多人。(香港政府新聞處授權)



28. 警方搜查位於灣仔莊士敦道的新中華國貨公司。(香港政府新聞處授權)

引言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響應左派陣營的號召，參與左派發動的「聯合大罷工」。時任政府水務局華人職工會理事的劉文成，自一九四六年加入工會以來一直認同「新中國」及「進步」思想。六七暴動爆發後，劉認為左派陣營可帶領港人「走向正義光明」，決定義無反顧地參與罷工。

但左派大罷工沒有出現左派期望的全港癱瘓局面，而當時水務局參與罷工行列的職員不到二百人，僅為全體員工的十分之一。當年大批參與罷工的政府和公用事業僱員失去工作，劉也丟掉月薪港幣一千七百港元的高薪厚職（當年工廠工人日薪一般只有六、七元，水務局一般工人月薪僅三、四百元）。¹

六七反英騷亂期間，左派陣營形容事件為「反英抗暴」，是值得謳歌、大書特書的「偉大愛國行動」。但暴亂以失敗告終後，左派四十多年來對六七暴動一直諱莫如深，即使外界偶爾重提事件，左派通常輕描淡寫地指騷亂期間即使存在一些過激行動，但對推動香港社會改革產生正面作用。

劉文成的坎坷遭遇，是左派論述下掩蓋的其中一個不幸故事。當年大批左派群眾響應領導層的號召，投身這場反英抗爭，許多人被捕入獄、失業、失學甚至被打死打傷，這些不見經傳的左派基層群眾多年來無人聞問，還要背上「左仔」、「暴

徒」一類的惡名。一些與左派沾不上邊的普通市民，也因警方鎮壓左派的行動而受牽連，糊裏糊塗地身陷囹圄。劉認為：「連同參與者及其親屬，六七事件受影響的人多達數十萬人，許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事件而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及背負終身難以洗脫的刑事罪名。如果北京長期對六七暴動避而不談，不公開承認參與者是當年錯誤政策的受害者，對我們這些左派追隨者很不公平。如果這段歷史被遺忘以至煙沒，沒有人講真話，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他相信，許多六七事件的參與者及家屬，都有當年被利用後遭遺棄及欺騙的感覺。

劉文成的擔憂不無道理。六七暴動告一段落後，北京對這次事件持否定態度。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了北京覺得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帳」。這種情況直至香港回歸中國前夕都沒有改變。即使香港回歸倒數前一年中國大陸出現「香港熱」，介紹香港歷史的報刊和電視特輯相繼湧現，卻沒有觸及六七暴動。例如北京中央電視台在香港回歸前攝製的紀錄片《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回顧香港百多年歷史時迴避了六七事件，大陸早期的香港史著作也沒有提及這次事件。而大部分內地學者在回歸前後出版的香港史著作，如《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史論叢》等，都沒有提及六七事件。

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九七回歸前夕出版的《香港》紀念畫集中，六七暴動和八九民運都不見踪影。而新華社九七年開設的「香港一九九七」網頁，也對包括六七暴動在內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歷史隻字不提。香港回歸前夕，中國文化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香港的歷史與發展》展覽，也沒有提及六七事件。

據筆者了解，這是因為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即回歸後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的前身）社長周南要「全盤否定」六七事件，認

為這是當年左派群眾的錯誤鬥爭。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在杭州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許家屯（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對六七年的問題「處理得不好」，將「反英抗暴」與大陸文革等同，令許多當年的參與者不服。張表示：「六七年的事情已過去了，中央覺得在過渡期重提這件事沒意思，翻歷史舊帳也不利和諧團結。」²

六七暴動期間關押在摩星嶺集中營的蔡渭衡，認為當年義憤填膺地參加鬥爭的一般群眾是最大的受害者，無奈有口難言。蔡說：「這場席捲全港的風暴確實為社會帶來災難的後果，我們身受其害，也連累了同胞受罪，談起來很難得到不明前因後果者的同情。於是當年不堪港英殖民統治而起來支援鬥爭的廣大愛國同胞都變成『左仔』，默默地成了這場災難的代罪羔羊。」³ 蔡曾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主席，二零一一年三月去世。

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王宏志認為，按照國內香港史論述強調反殖反帝思想的邏輯，六七暴動本來是明確的反英反殖的活動，但「當國內的歷史論說否定了文革的極左思想後，從這種極左思想引發出來的香港『六七暴動』，便不能受到肯定了。」⁴

這種情況在香港回歸後才出現微妙轉變，一九九八年，紀念周恩來誕生一百週年的電視紀錄片《周恩來》其中一集婉轉地提及香港六七年出現「圍攻港督府」事件，以及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二零零二年，曾任職《文匯報》的左派報人周奕出版《香港左派鬥爭史》，書中部分章節觸及六七事件，是首部由左派人士執筆，從左派角度記述六七暴動的著作。該書從左派陣營的本位出發，雖然作者承認六七事件是「極左思潮的產物」，但對左派人士的行動持肯定態度，對港英當局鎮壓行動着墨較多，而對部分左派群眾的過激行徑則輕輕帶過。⁵

對步進中年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六七年的夏季可能是香港歷來最悠長、最難熬的夏天。當時神州大地正進行翻天覆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香港這顆巨龍口裏的明珠也能感受到灼熱的革命鬥爭烈焰。六七年五月，香港左派陣營乘着文化大革命的「東風」，在香港發動號稱「反英抗暴」的抗爭行動，「打倒港英」、「結束港英法西斯暴政」、「港英不低頭就走頭」的口號響徹雲霄，香港各大公共屋邨外牆寫滿了「黃皮狗」、「白皮豬」的字句；港英政府面臨百多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市民對前景的信心異常脆弱。

那是理性向激情讓路的時代，是政治口號掩蓋理性思考的歲月。是年七、八月開始，香港各地硝煙瀰漫，「菠蘿」（土製炸彈）遍地，五十一人在暴亂中喪生（其中十五人被炸彈炸死），整個社會籠罩着一片恐怖氣氛。香港資金大量外流，外國遊客裹足不前，更一度出現北京有意提早收回香港、紅衛兵企圖衝擊中港邊境的傳聞，當時「香港前途」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英國政府曾擔憂中國提早以武力收回香港，一度埋首制訂撤出香港的計劃；英國國防部更曾探討採取核威懾手段，阻嚇中國對香港採取極端行動。

六七暴動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延伸，但六七騷亂的導火線是六七年四月爆發的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當時廠方公布新的工作規例，部分工人認為不合理，與資方交涉。六七年四月底，資方解僱六百五十名不接受新規例的員工，激發部分工人抗議，五月六日在工廠外集結的工人因企圖阻止資方將貨物運出廠外與管理人員發生衝突，二十一名工人事後被警方防暴隊拘捕。左派工會抗議工人被捕，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左派陣營逐漸將事件升級為反英抗爭。

香港人造花廠工人的抗爭絕對不是無理取鬧，相反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當時廠方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今天回看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當時的英國聯邦事務大臣Herbert Bowden⁶承認，人造花廠管理層在勞資糾紛初期處理不當，大規模解僱員工更成為五月六日衝突的伏線。⁷在騷亂初期，部分與左派沒有直接聯繫的市民，也參與了抗爭活動。例如一些在九龍東徙置區居住的青少年，也出於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在左派示威者與警察對峙中擲石洩憤。但隨着抗爭升級，左派逐漸將事件政治化，忽略了原本能爭取市民同情的勞工福利課題，並慢慢地失去了鬥爭的支持基礎。

六七暴動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形容六七暴動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不容否認，沒有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香港六七年就不會出現規模如此龐大的左派暴動。當時香港左派祭出文革口號，在街頭揮舞《毛語錄》，鬥爭後期更採取武鬥的形式反擊港英當局的鎮壓行動，在在體現國內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自一九四九年長期負責香港事務，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務實政策。香港左派發動反英鬥爭初期，周恩來多次約見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及港澳工委（新華分社的真實身分）官員，強調對英國的鬥爭必須「有理、有利、有節」，「不能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也反對在香港動武。他指出：「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周恩來私下對香港左派的極端做法很有保留，但礙於文革極左思潮佔主導的政治現實，不便公開制止香港左派的行動；加上國內形勢失控，北京領導層對如何處理香港局勢缺乏共識，周恩來又窮於應付國內紅衛兵的派系鬥爭，遂令事件逐漸升級。

香港恰如一葉置身南中國海岸的孤舟，來自深圳河以北的

風雲變幻，都會令它起伏不定。北京在文宣上的高調聲援，令香港左派陣營極度鼓舞。《人民日報》六七年六月三日社論呼籲香港左派「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更被不少左派領導人演繹為北京對左派陣營的堅定支持，甚至作出隨時收回香港的準備。左派騷動在六七年下半年越演越烈，部分左派群眾甚至採取在街頭放置炸彈的極端手法。七月八日，三百多名大陸民眾越過沙頭角邊境，與香港警察發生槍戰，沙頭角警崗遭機關槍射擊，五名警察身亡。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曾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總理周恩來獲悉後迅速制止，才不致出現香港「提早回歸」的局面。

六七暴動究竟是否得到北京高層支持，以及發動騷亂的責任誰屬，一直是六七暴動研究的爭議課題。如果新華社香港分社和香港左派陣營沒有北京的默許和認可，當時不可能發動大規模的反英鬥爭。六七年五至八月這四個月內，《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兩篇社論和八篇評論員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鬥爭，而中國外交部數度向港英當局和英國政府提出抗議，使香港左派一度以為得到北京鼎力支持。

但梁上苑明確表示，六七事件不是由北京發動的，周恩來曾嚴令制止解放軍越過深圳邊界，國內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給香港左派使用，正是騷亂不是由北京主動發動的例證。他認為，騷動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共港澳工委）所發動的，以中共黨內常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應付中央，就是先造成了既定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梁指出，在反英抗暴的整個過程中，「一切的鬥爭都是港澳工委所領導的有組織行動」。

至於新華分社負責人為何「陽奉陰違」，違背北京高層自五十年代以來的對港政策，以及文革爆發後周恩來及國務院外

事辦公室（中央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傳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的指示，筆者綜合採訪多位左派領導人的看法，認為最具說服力的解釋是面對極左思潮狂飆的新華分社高層官員，為求自保而主動發起鬥爭，矛頭指向殖民政府，並在騷動中不斷煽動群眾。文革期間國內「當權派」頻頻挨鬥，許多部門負責人被批鬥，中國駐外機構多位負責人也被召回國揪鬥。香港新華社一些高層官員擔心被撤職或調回國內批鬥，他們為求保住烏紗帽，遂主動發起反英鬥爭，設法發動群眾鬧事，以樹立政治上可靠的形象。

與此同時，一些新華分社中下層幹部，包括八十年代後期出任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已在社內張貼大字報，打算批判領導幹部。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部長何銘思接受筆者訪問時透露，時任新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及副社長祈烽在文革爆發後一度手足無措，曾在中環告羅士打行的中資機構中央航空公司辦事處掃地，以示「沒有脫離群眾」，而當年社內有一些由內地調派的幹部也企圖將國內極左做法搬到香港，令梁、祈兩人備受壓力。事實上，在當時極左思潮的主導下，加上中共體制下「層層加碼」的本質，新華社領導官員即使企圖頂住，現實上也不可行，「順勢而行」是自然的選擇。

一九六六年底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大獲全勝，香港左派社團紛紛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自四九年以來一直因遭港英政府打壓而深受壓抑的左派陣營領袖，不免萌生對港府的反抗情緒。而梁、祈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勝利」時，聲言在香港「大幹一場」。此後新華社和香港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口實，而六七年此起彼落的勞資糾紛就成為千載難逢的良機。

香港左派陣營一直認為，六七年的勞資糾紛和社會矛盾，是六七暴動的主要成因。筆者同意香港六十年代存在不

容忽視的社會矛盾，但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觸發騷亂（當時國內尚未爆發文革），左派陣營袖手旁觀，左派報章更支持當局平息騷亂，事件因此沒有演變為大規模的騷動，反證了文革對香港六七暴動的直接影響。社會矛盾在香港長期存在，六七年勞資糾紛俯拾皆是，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的鼓動，六七暴動是不會以後來呈現的形式進行的。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顯然對發動以至煽動左派群眾、擴大事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魯平表示，「反英抗暴」主要負責任的是新華分社，文革後中央在對港政策「撥亂反正」，主要的工作重點是整頓新華分社，把一些領導官員調回國內。

雖然部分左派群眾在暴動期間採取過激以至暴力抗爭手段，破壞社會的安定，但回顧六七暴動這段歷史，不能忽略釀成這次事件的社會土壤。六七暴動前夕，香港社會躁動不安，處於社會動亂的火山口。當時香港一半人口年齡低於十九歲，大量人口聚居在生活條件欠佳的徙置區，低下階層市民生活困苦，在一定程度上構成騷動的客觀基礎。⁸ 當時社會正面對經濟衰退，令原有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勞資糾紛此起彼落。港英當局唯恐文革的火焰燒到香港，市面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如臨大敵。源於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後來升級為大規模騷動，顯然是港英處理不當、激化矛盾的結果。

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但不少社會人士批評港英當局沒有着力改善民生及保護勞工權益。直至六十年代以前，港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社會福利，除了涉及工業安全的法例，香港的勞工法例絕無僅有。根據一九六六年香港人口統計數據，在十至十四歲的年齡組別中，僅百分之十三接受中學教育。而港英政府六七年四月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坦言，當時香港工人缺乏就業保障，工人都是「可以隨時解僱的散工」。⁹

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平息後，港府成立騷動調查委員會，後來發表的報告婉轉地指出因加價而引發騷亂的社會根

源，並對港英當局的管治提出含蓄的批評，促請當局設法縮窄官民之間的鴻溝。報告同意如果香港不是隱藏對社會和經濟情況的不滿情緒，示威不可能得到民眾那麼大的支持。委員會同意必須在經濟及社會方面注意若干因素，「以免將變為足以釀成騷亂的原因」。¹⁰

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逐漸認同推動社會改革的需要，政府內部推動改革的動力開始湧現，例如六七年四月港府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提出以當時的標準來說頗具前瞻性的改革建議，包括設立強制性公積金、失業和疾病保障制度，但這些改革措施因商界的強烈反對而沒有落實。六七暴動顯示香港人僅基於對共產統治的恐懼而消極被動地支持港英當局，港英政府在騷亂平息後察覺需要通過改革去紓緩社會矛盾，爭取民心。

Alan Smart及呂大樂認為，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連串動亂（包括六七暴動）表明重大改革無法避免，港英政府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萌生社會改革的念頭。而六七暴動暴露殖民地政權缺乏認受性的脆弱性，事件與勞資糾紛的密切關係，令港英政府不得不重視勞工問題，以爭取民心。¹¹ 雖然左派陣營在六七年底北京高層下令鳴金收兵而偃旗息鼓，但港府高層明白不能再對改善民生置若罔聞，改革顯得刻不容緩，六七暴動可說是推動殖民地政府推行社會改革的催化劑，或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負責鎮壓暴動的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九九年接受筆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他表示：「當局從騷亂中汲取教訓，推行一系列改革。六七年以前，官民之間缺乏真正的接觸渠道，暴動結束後我們趁機設立新的機制。如果沒有發生六七暴動，我不認為港府會推行任何改革。」

六七暴動對推動社會改革的關鍵作用，在於消除商界抗拒的情緒。暴動結束後，一直希望港府推動社會改革的英國執

政工黨政府，進一步向殖民地政府施壓，來自倫敦的官員和英國國會議員紛紛促請港府推行改革。英國聯邦事務國務大臣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 石寶德 (Malcolm Shepherd) 六八年五月在致聯邦事務大臣的信件中，就延長港督戴麟趾 (David Trench) 任期的利弊表態時表示，「許多工作亟待推展……去年的騷亂象徵自由放任時代告一段落，需要作出改變。」

在英國官員心目中，亟待改變的是香港商界反對社會改革的現狀。英國政府清楚了解，騷亂爆發前行政局和立法局內的非官守議員一直反對推行社會改革，而暴動意外地為消解商界的反對聲音提供新的動力。

港英當局在暴動結束後，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縮短工時、大量興建公屋及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六七年十二月，港府修訂勞工法例，將女性及年輕人的工時縮短至每星期五十七小時，七一年更進一步削減至每週四十八小時。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七一年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後，加快社會改革的步伐，翌年實行小學免費教育，七八年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 (即六年小學及三年初中)。港府七一年推行公援計劃 (後易名為綜援)，扶助有需要人士，並於七三年公布十年建屋計劃，紓緩中下層市民的住屋問題。為了縮窄官民之間的鴻溝，港英政府於六八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在港島及九龍設立民政署，了解市民對政府政策的反應，爭取市民支持，並接受市民投訴。

自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直懷疑香港居民的忠誠，但六七暴動意想不到地扭轉港英政府對港人的猜疑。曾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顧汝德 (Leo Goodstadt) 認為，騷亂改變了政府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令港府承認港人爭取權益的合理性。「六七暴動期間，港府清楚看到香港人的紀律性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商界也看到工人士氣高昂，而且非常勤

奮，左派大罷工期間大部分工人如常上班，即使公共交通瀕臨癱瘓仍然堅持徒步一兩小時上班。這些現象有助減低商界反對改善勞工權益的聲音。港府明白如果市民爭取一些合理的權益，你只能說『是』，因為你沒有藉口說不。」¹²

港英政府在暴動結束後推行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贏取人心，爭取港人對殖民地的積極認同，甚至營造管治獲被統治者認同 (government by consent) 的局面。暴動迫使上層精英靠攏港英當局，追求生活安定的一般市民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逐漸認同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打着反殖旗幟的左派暴動，最終卻驅使港人支持港英當局，不啻是歷史的諷刺。政治學者 Ian Scott 認為：「諷刺的是，考慮到共產主義者原來的目標，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¹³

六七暴動的腥風血雨，進一步加深香港人固有的恐共情結，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長期存在，即使回歸後仍未消除。曾借調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中聯辦) 的內地學者強世功認為，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左派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工程。他指出：「港英政府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與內地逃往香港的國民黨達官顯貴、大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應，使得『恐共』、『仇共』成為香港社會的基本民情，香港社會形成了對內地的排斥心理，隨着香港經濟的起飛，更增添了對內地的優越意識，不願意香港回歸，這成為今天困擾香港政治的深層原因。」¹⁴

事實上，港英政府為了爭取市民支持鎮壓左派騷亂，在

暴亂初期迅即成立由高層官員組成的「宣傳委員會」，負責「引導輿論」，散播對左派陣營不利的消息，甚至抹黑左派陣營的負責人。與此同時，港府着力營造「香港身分」(Hong Kong identity)，於一九六九年耗資四百萬港元，舉辦首屆「香港節」(Festival of Hong Kong)，加強年輕人對香港的歸屬感。曾任教香港大學的人類學者田邁修(Matthew Turner)認為，「公民」、「社區」、「歸屬感」等用語，直至六七年才被港府在反共宣傳中大量採用。¹⁵

撤除港英政府宣傳機器的刻意經營，六七暴動客觀上喚起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本質上是「難民社會」，只是暫時躲避中國大陸戰亂的棲身之所。六七暴動過後，香港人終於發現相比動盪不安的中國大陸，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是應當珍惜的樂土。六七暴動同時喚起了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並催生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具有社會良知的青年一方面抗拒香港左派的極左行徑，另一方面卻難以認同港英當局的粗暴鎮壓行動。雖然港英當局成功鎮壓六七暴動，但當時終究有數以萬計的市民公開表明不認同港英統治，間接催化一般市民與港英抗爭、及追求公義的意識。人們發現港英的統治權威也可以受到挑戰，逐漸敢於表達對各種社會簡疾的不滿。廉政公署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指出：「六六至六七年間發生的暴動，挑戰了政府的威信。自此以後，香港市民漸漸敢於公開譴責貪污行為和政府對此視若無睹的態度。」¹⁶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六七騷亂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秩序帶來嚴重衝擊，大部分港人對左派陣營的過激行徑感到不滿。暴動因而強化左派與香港主流社會長期存在的隔膜，左派自暴動結束後覺得被港英和主流社會抹黑，長期陷入自我孤立的狀態，並產生「被圍困」的心態

(siege mentality)和受害者情結。暴動以失敗告終後，左派工聯會轉以內務為主，不參與社會事務，杯葛勞工顧問委員會等港英勞工諮詢架構，也沒有派員參與八二年舉行的首屆區議會選舉。這種與香港主流社會隔絕的局面，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漸改變。但前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健表示，左派陣營「被圍困」的心態從九十年代開始逐漸減退，但至今部分左派陣營負責人仍然抱有這種心態。

左派「被圍困」的心態和因事件被北京否定的鬱結，對香港的政治生態產生深遠的影響。前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指出，六七暴動使左派人士長期受到其他香港市民所排擠及港英政府所打壓，從而逐漸形成與主流社會隔絕的社群。「這種與主流社會的隔膜，久而久之在不少左派人士心中形成了一種受壓迫的感覺。基於這種感覺，他們對自己在回歸後的際遇，便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渴望『翻身』與『出頭』的期望。當這些期望沒有得到實現的時候，他們對特區領導人自然有所不滿，而這些不滿又不容易消除。」¹⁷

踏入八十年代，北京着手處理香港主權問題，積極拉攏工商界，傳統左派雖然長期追隨中國政府，但反而逐漸受到冷落。香港回歸後，左派人士獲委派具實權的職位不多，更被特區政府視為理所當然地支持政府政策(包括不獲民眾支持的政策)的政治力量。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傳統左派龍頭政黨民建聯因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區議會選舉中慘敗，當時的民建聯主席曾形容該黨「有辱無榮」。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歷史往往成為現實的註腳，現實往往是歷史的折射。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祭起維持社會秩序的大旗，高調宣傳「繁榮安定」論，左派傳媒則對這種論調口誅筆伐。中英兩國八四年簽署《聯合聲明》後，中方繼承了港英當年的歷史話語，經常在香港問題上將「繁榮安定」掛在嘴邊，形成了強烈的歷史反諷。與此同時，六七暴動已成為香港社

會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香港在回歸初期掀起裁員、減薪風潮，一些勞工界領袖不忘提醒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六七暴動的歷史教訓。近年香港民怨上升，一些論者也促請政府以六七暴動為鑑，及早紓緩社會矛盾。

六七暴動這段本已隨着歲月褪色的歷史，近十年來成為揮之不去的幽靈，令原已相當分化的香港社會進一步撕裂。二零零一年，董建華宣布向六七暴動期間擔任香港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主任的楊光，頒發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勾起不少市民的歷史創傷。¹⁸ 事件觸發香港社會激烈爭論，甚至引發北京和特區政府是否企圖改寫歷史的議論。

二零一零年五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聲稱六七暴動期間被暴徒燒死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死於社會動亂」、「當時香港左派未必想置林彬於死，我相信置林彬於死的人，並非香港左派」。同屬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陳鑑林也聲言，當年暴動死傷的人「不只林彬一個」，可能還有很多一般市民，「他們都不知甚麼原因死亡，可能因為有暴徒」。部分傳媒隨即追究左派陣營應否為林彬之死負責。

陳、黃兩位來自左派龍頭政黨的議員的辯解，反映左派陣營中相當部分人士思維的局限，特別是暴動結束以來揮之不去的受害者情結，即自己陣營也有不少死傷者，區區一兩個「非我陣營中人」遇害又有甚麼大不了？

部分左派中人在六七事件中失言，反映他們對這宗悲劇缺乏認識，也長期缺乏深刻反省。而左派四十多年來鮮有對受騷亂波及的一般市民表示歉意，客觀上令這道歷史傷痕難以癒合，也令六七暴動成為左派陣營的「原罪」，這一包袱甚至長期伴隨一九九二年才成立的左派政黨民建聯。

雖然六七暴動對香港歷史影響深遠，但左派陣營四十多年來對事件諱莫如深，許多當年的參與者不願重提舊事。據筆

者了解，中英雙方在八十年代初期基於「平穩過渡」的考慮，建立彼此不翻這段歷史舊帳的默契。暴動期間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的左派人士蔡渭衡接受筆者訪問時披露，騷亂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祈烽曾向他表示，八十年代初中英雙方商討香港前途期間，達成「不翻歷史舊帳」的共識。此舉旨在確保香港在過渡期間保持穩定，北京自此對六七暴動幾近絕口不提，遑論為此譴責港英政府「鎮壓香港愛國同胞」。二零零二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六七年的事情已過去了，中央覺得在過渡期重提這件事沒意思，翻歷史舊帳也不利和諧團結。」

而香港官方、主流社會和左派陣營對這次事件的記述和評價各走極端，不是全面抹殺，就是一片歌頌溢美之辭，缺乏從中立角度敘述和評價事件始末的作品。在港英當局的論述裏，六七暴動是左派陣營「搞亂社會」的破壞行動，當局的鎮壓行動「獲得絕大多數市民支持」（港督戴麟趾更聲稱得到「百分之九十八市民」支持）。左派陣營則堅持這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抗爭」，並從「壞事變好事」的角度，辯稱事件「推動了香港社會進步」。歷史真的這麼簡單，非黑即白嗎？筆者自九十年代末期以來一直利用工餘時間研究六七暴動，正是試圖在簡化了的歷史陳述中，挖掘六七暴動複雜的歷史真象，為讀者提供多角度的思考空間。

香港回歸中國後，一些六七年被捕入獄的左派人士醞釀發動「翻案風」，希望九七後獲特區政府「公平對待」。據筆者了解，左派人士中「有相當意見」要求特區政府處理六七年的歷史問題，甚至通過正式程序推翻當年的罪名。九七年十月，曾德成獲聘為中央政策組顧問，提出要「正確看待歷史遺留的問題」。他表示：「在殖民管治時期，有些機構、團體以及個人，都曾受過一些不公平對待，所以一些老愛國人士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對過去這些不公平對待，作出一個公正對待。這

些愛國人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的要求也十分合理，不過由於特區政府目前尚在成立初期，百業待興，因此大家暫時宜應向前看，待特區政府妥善解決當前的急切事務後，才着手整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¹⁹

據筆者了解，九七年九月中秋節，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邀請一批「曾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出席在前港督府（現已更名為禮賓府）舉行的中秋酒會。部分六七事件參與者和抗日戰爭期間保衛香港的東江縱隊隊員也接到請柬，胡棣周、楊光、廖一原等六七暴動參與者獲邀出席。時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在酒會期間主動對胡棣周表示：「這件事其實很不公平，這不只是你個人的問題，曾德成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件事特區政府要慢慢來。」梁愛詩的舅父黃祖芬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左派中華中學校長，曾被港英當局拘禁於摩星嶺集中營。嘴邊經常掛着「國家好，香港好」的董建華，少年時代曾在中華中學就讀。梁愛詩這番話，令人聯想特區政府有意重新處理六七暴動的「歷史問題」。

特區政府在回歸後多次向六七暴動參與者頒發勳章，不啻是調整對六七事件立場的訊號。一九九九年七月，董建華宣布向工聯會會長李澤添頒授大紫荊勳章，表揚李氏對香港社會的貢獻。而前左派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也獲頒金紫荊星章，多名左派學校畢業生也獲封為太平紳士。黃建立在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各界鬥委會副主任委員，當時擔任左派鞋業工會理事長的李澤添則是鬥委會委員。以兩人的背景，港英時代是不可能獲得這種榮耀的。至於董建華二零零一年向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看來是連串授勳行動的「完美句號」，據筆者了解，這是左派陣營向特區政府「長期爭取」的結果。

六七暴動一直是分化社會的爭議事件，導致主流社會長期排拒左派陣營，也造成部分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一批群眾在北愛爾蘭城市Derry街頭示

威，駐守當地的英軍開槍鎮壓，十四名示威者身亡，這次慘劇被稱為「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經過長達十二年的調查後，二零一零年六月英國政府發表調查報告，指出當時英軍向示威者開槍缺乏理據，首相卡梅倫 (David Cameron) 更公開為這次事件的死者表示深切歉意。

六七暴動或許不能與「血腥星期日」簡單類比，但特區政府何不考慮在適當時候成立類似英國的調查委員會，或九十年代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找出六七事件的真相，以撫平這段歷史傷痕？²⁰